



回首北宋历史,其成败得失,可述、可评者多矣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峰在著作《武士的悲哀: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》一书细致梳理北宋王朝的演进轨迹,指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,是深刻影响其发展的导向性精神,也是引领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,其余波直至南宋依然不绝。

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

□陈峰

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引导下,北宋当政者以内部稳定为施政的重心,在边防上采取消极防御战略,即强调文治建设,军事规划则趋于保守,也就是在对待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关系上,权重明显倾斜到前者。可以说,这既是对以往教训的矫枉过正,也是极端现实主义逻辑的表现,由此遂与以往统一王朝形成很大不同。兵家鼻祖孙子曾指出:“是故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者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”这当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最高制胜境界,而宋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地以和缓战的做法,似乎就此寻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论依据。借助“议和”的经济方式处理外患的做法,固然打着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旗号,却明显表露出保守退缩的精神状态。西方学者也认为,宋王朝“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”,“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”,便与辽议和,“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”。

对于北宋长期实行的崇文抑武治国思路,需要冷静客观地评价,不能一概而论。凡事着力于一端,必难顾及另一端,此即“双刃剑”效应,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实践,便带来对外边防的相对失败与对内发展的相对成功的结果。这一消极影响已见上述,在此还要对其正面成效简要说明。

由于宋朝长期关注内部建设与发展,主要精力放在追求政治秩序与社会的稳定方面,倡导文治,注意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,为此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,具有明显的怀柔理性成分,因此保持了宋廷长期的控制力,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有较长时期的稳定局面。大致而言,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:

其一,北宋王朝除了末年外,在大多数时期内上层的矛盾斗争相对缓和,政治动荡相对较少,既没有产生如汉唐中央的宦官专权、权臣当道、外戚干政的突出问题,也没有出现地方上的豪强大族盘踞或藩镇割据的局面,更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;

其二,宋朝的制度建设虽然不免繁杂,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,但选官、监察、法制等制度相对完备,多数帝王与官员注重程序规矩,从而使得其政治的文明程度超越了前后许多王朝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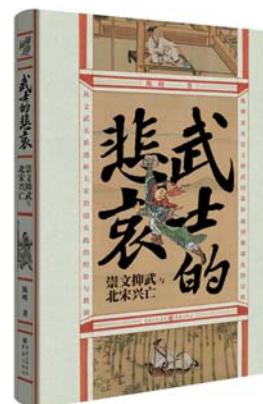
其三,在实行募兵制的情况下,一般的兵役与劳役由军队承担,明显减轻了民众所受干扰,对保护社会生产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;

其四,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超过以往任何时代,特别是商品经济活跃,市场与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,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的社会经济状况便是其形象化的反映;

其五,文化教育及科技快速发展,成就斐然,社会整体的文化知识水平显著提高;

最后,在特权门阀士族消解的背景下,实用主义的文治路线促进了社会的上下流动,普通地主以及部分平民获得上升的机会,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,以至于被外国学者称之为“市民社会”“近世社会”。

因此,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:本朝“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,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”;宋人又总结道:“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,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。”元代人修宋史时则评价说:“宋恃文教,而略武卫。”即明确地揭示了宋朝国运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史实。由此,两宋时期经济、文化及科技独领风骚,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评价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赞誉道:“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,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,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。”也可以说,中国古代经历的



《武士的悲哀:
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》
陈峰 著
华章同人 | 重庆出版社

唐宋时代变迁转型,就包含了这一重要的方面。

话归主题,宋朝居于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、文明程度最高的地位,并首先发明了火药武器,然而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,火器这种巨大革命性技术的投入,也未能引发军事变革和应有的效用,而长期处于对外被动挨打的境地,北宋和南宋先后亡于边患,终以“积弱”为后世诟病。推究其因,固然有多种解释,但根本还在于宋朝自身的治国方略及其实践的结果。

从今天的角度来看,所有国家都面临处理建设与国防、内政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,尤其是大国,其国防与外部环境是否良好,对国内的建设有重要影响;反过来国内建设是否成功,又直接影响到其国防的实力。说到底,就是如何解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一人类社会长久遇到的两难问题。仅满足于和平建设而轻视国防显然属于短见,穷兵黩武而忽视和平发展也同样无益。诚如古人所云:“故国虽大,好战必亡。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”现代西方著名军事家利德尔·哈特也认为:“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,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……一个国家,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,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,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。”如果说这一深刻的认识,是在日益理性和多边制约的现代国际关系下,告诫人类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,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强烈的现实关怀,那么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,实施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,过早而被动走上了脱离军事的主和道路,可谓过犹不及。因为当时还是一个武力战争不受任何约束的时代,多少先进的文明都在惨烈的战火中毁灭,种族灭绝的悲剧也不会引发征服者心灵的战栗。宋朝不能保持自身的军事强势,对外长期采取守势,其军队和边防也就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,一旦内外平衡被打破,就会陷于被动挨打乃至亡国的境地。

总之,宋代以前诸统一王朝,在治国上注重寻求文武并重,力图保持内外平衡,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进取举措压制了塞外军事威胁,从而呈现一个时期的强盛局面。其外部压力固然解决,但随着国力的巨大消耗,内部矛盾却快速上升,造成统治秩序动荡,王朝终因内部危机的爆发而走上下坡路,直至覆灭。而听任外部威胁加剧,对统一王朝不仅是耻辱,而且会造成难以容忍的被动挨打结局,从而会影响到内部建设与大一统的局面,这就成为一种悖论与矛盾。战争与和平的冲突,成为古今中外难以万全应对的重大难题,考验着当政者的政治智慧。宋朝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及重内轻外的路线,有利于内部长期的稳定发展,却牺牲了外部环境,最终因此亡国,这便是非常惨痛的教训。

电影的口音

×
贾樟柯
谈
贾樟柯

(美)白睿文 编

新书秀场

《电影的口音:贾樟柯谈贾樟柯》

[美]白睿文 编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贾樟柯所有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对写实主义的关怀。”美国学者白睿文基于对中国文化与电影的研究,对贾樟柯深入访谈,以对话的方式阐释两人看待电影与社会的态度。本书以年代为序,集中探讨了从《小山回家》《小武》到《江湖儿女》等10部重要的电影,也是贾樟柯电影人生的梳理与总结。贾樟柯亲述从汾阳走向世界背后的动人经历,分享每一部经典作品背后的传奇故事、创作缘起与理念,记录各个创作时期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,对于社会、现实的关怀和反思。

《她来自马里乌波尔》

[德]娜塔莎·沃丁 著
新星出版社

娜塔莎·沃丁十岁的某天,母亲出门便再也没有回来,后来才得知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,没留下只言片语;父亲则酗酒,终日埋首俄语书籍。在那之后,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对母亲一无所知,唯一知道的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,1943年作为强制劳工被驱离乌克兰,前往德国。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,娜塔莎·沃丁一点一点地把碎裂的瓷片拼接在一起,她发现,母亲家族的过往是一个巨大的谜,是一则关于东欧苦难的历史寓言……作者用迷人的方法完整还原了一部母亲的个人史、家族史、二十世纪动荡史。虽然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,却比虚构作品更魔幻,更戏剧化,也更惊心动魄。

《蜂巢思维: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》

[美]萨拉·罗斯·卡瓦纳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人是社会动物,其思想、观念、对现实的感知,都直接或间接为社会、为朋友、为同学、为同事所同步。每一个人都像身处在一个巨大的蜂巢之中,共享着一种思想、一种情绪、一种观点,这就是“蜂巢思维”。从真实的群体暴乱到网络暴力,从群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到社交媒体的各种弊端,心理学家萨拉·罗斯·卡瓦纳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,结合心理学、社会学和神经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,全力探索蜂巢思维如何影响个体的意识、重塑我们的社交方式,以及我们如何减轻或抵消互联网时代蜂巢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


传统家族的“香火”是如何绵延的

□王淼

幼医,指的是婴幼儿的专科医生;幼蒙,指的是年幼,也可以引申为婴幼儿的养育与教化——熊秉真教授的《幼医与幼蒙》有一个副标题“近代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”,其内容乃是以婴幼儿的医疗、养育与教化为视角,来审视中国传统家庭与社群中的个体生命,如何诞生,如何存活,如何趋生避死,使得子孙得以繁衍,家族得以绵延——从精神层面说,关注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其新生成员,即是关注这个社会对个人与生死的基本态度;从现实层面说,关注一个社会的育婴方法,即是关注这个社会养育婴幼儿的知识和技术的普遍水平,从中既可以折射出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,亦可以洞悉这个社会的人口行为和物质文化,不妨视作认识历史、观照现实的一条重要途径。



《幼医与幼蒙》
熊秉真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个社会的绵延和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,原本就是与幼医和幼蒙分不开的——幼医保障婴幼儿的身体健康与基因强健,更有益于他们的传宗接代;幼蒙保障婴幼儿的智力开发与精神发育,更有益于他们未来的发展。传统中国社会本来就有极其丰富的幼医与幼蒙文化,但在很大程度上,却为“帝王将相”的历史叙事方式所遮蔽,各类史料、文献大都忽略个体的发现与细节的描述,而婴幼儿则成为被史料遗忘的人群。尤其是近代以降,西方文化携物质与技术强势输出,而“中国的社会史、文化史、家庭史即在此自怨自艾,封建中国百般‘不是’,过去一直黑暗,前景一片茫然中痛苦、挣扎、折腾不已”。

在此近代中国的忧患意识与激越革命的背景之下,一般史论对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与社会组织的轻视与否定,就成为必然趋势——其直接的后果是,中国历史上幼医与幼蒙的真相逐渐湮没无闻,所谓“前无作者,虽善弗彰;后无述者,虽盛弗传”,最终落得人云亦云,任人评说。

熊秉真教授写作《幼医与幼蒙》一书,首先志在于还原传统社会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形态。她认为近代政治论述下的中国家庭史与社会史,不仅记载多有遗漏,论点失之偏颇,而且口号式的抨击多,实质性的内容少。她以大量传统幼科典籍中的史料记载与古今笔记、传记材料为线索,以具体个人、个别家庭的生命载体、以及系年谱牒的原始史料,进行交相核对,互为增补,勾勒出幼医与幼蒙救亡图存的发展过程,描述出传统家庭抚养生命的种种细节,借以挖掘中国历史上人生之启端,探求婴幼儿的生命如何存活、如何教化、如何成长。在熊教授的论述中,有一个关键词,曰“由下而上”:这既代表了对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层次——诸如古今个体生命之起端、个人身体存活之条件,乃至人类最终的疾病与死亡之了解,同时也象征着一种还原历史的视角——以看似庸凡琐碎的细节还原古今家庭生活与育儿之道,不仅更接近历史真相,在廓清各种偏见方面显然也更具有说服力。

正像熊教授所说的那样,人类虽号称万物之灵,但其生其长,其育其养,在开启生命的最初时刻,其脆弱易逝,与其他动物并无二致。幼医与幼蒙的进步,使得人的生存有一个更好的开始,自不待言,对幼医与幼蒙发展历史的研究,则能够看出社会人群生活演变的过程:中国传统家庭和社会究竟有些什么,没有什么;究竟有着怎样的形态,为何有这样的形态,如果缺少了幼医与幼蒙这一环,显然无法呈现出完整的面貌。的确,身体生命之延续与社会文化之传递本来就是难分难解的,幼医与幼蒙既深受制度与风俗的影响,其进展亦离不开人文传统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。在一个注重家族绵延和“香火”传承的社会中,幼医与幼蒙隶属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一部分,其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。